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2025年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中國抗日戰爭勝利八十周年，世界各國勢必舉行盛大的紀念活動。在當今世局動盪不安的背景之下，尤其值得我們思考戰爭與和平的真諦。本刊歡迎海內外學者賜文探討，包括相關課題的學術論文、研究筆記或書評、隨筆。

——編者

晚清政府幻想中的中德美聯盟

林曉萍〈擺脫孤立之路：日俄戰爭後清政府的聯盟外交實踐〉（《二十一世紀》2024年4月號）一文追溯晚清政府內部對中德美聯盟的設想，筆者以為，這一外交舉措基本上只是幻想。首先，清朝被視為「垂死之國」，而德國自信將贏得二十世紀的生存鬥爭。1890年德國首相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下台後，德皇威廉二世（Wilhelm II）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任用順從於他的人來取代相對獨立的大臣。威廉二世並非缺乏才能，只是缺乏穩重和多變。圍繞着威廉二世，私人顧問、首相，外交部、大參謀部，尤其是海軍部，形成

了幾個相互對立的權力中心。這些德國外交決策層與十九世紀末的社會思潮緊密相連，其中包括社會達爾文主義、種族主義、軍國主義、大國聲望感以及爭奪「陽光下的地盤」的觀念。自1897年德國強佔膠州灣，到1900年威廉二世發表「匈奴演說」，無不表明德國外交決策層根本不將清政府視為平等國家，而威廉二世更是「黃禍」的主要宣傳者。

其次，德國與日本的友好程度遠超過與清政府的關係。1907年4月4日，在為兩位德國醫生舉行半身銅像揭幕儀式時，東京大學醫學院院長青山胤通致辭說：「談到醫學科學時，我們國家是德國的殖民地。」這一言論表明了德國在醫學領域對日本的顯著影響，而醫學領域僅是德日合作的一個方面。德日之間展現的不僅是密切的政治文化聯繫，而且是以經濟貿易和技術交流為核心的關係。儘管1895年德國外交決策層決定干涉遼東，德國駐日公使馮·古施密德（Felix von Gutschmid）傲慢的外交恫嚇一度導致德日關係較為緊張，然而，在日本留德學生群體和利益團體進行溝通、斡旋和游說下，兩國關係很快就得

到緩和。相較之下，清政府對德國的影響力遠不及此，缺乏類似的有效渠道和廣泛影響力。

最後，在1914年之前，美國參與了歐洲列強之間的全球爭霸，但在外交上堅持「獨立的國際主義」（isolated internationalism）政策，不會與黃色人種國家結盟。作為歐洲權力政治的信奉者，美國總統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奉行「大棒政策」（Big Stick Policy），他積極在遠東推動建立大國之間的均勢，而不是將美國與貧弱的中國捆綁在一起，以免限制美國在華的經濟擴張和外交主動權。

總而言之，晚清政府雖努力突破外交困局，但清廷仍未意識到內政外交困境的根本原因。外交乃內政的延伸，其決策層設想的中德美聯盟多為空談，其思考與行動皆值得深入反思與借鑒。

顧年茂 上海

2024.5.1

中國對阿援助的系統考察

華中師範大學教授張安的〈從「以蘇為主」到「與蘇爭奪」：中國對阿富汗援助的歷史考察（1949-1966）〉（《二十一世紀》2024年4月號）一文，是筆者所見目前為止國內外學界最為全面且深入探討中國援助阿富汗問題的學術佳作。該文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的大量檔案和其他歷史資料，系統考察了新中國成立後至文化大革

命前中國對阿富汗援助的歷史全貌和詳細過程。

首先，作者重新審視和考證了中國對阿援助的時間起點問題。與學術界普遍認為中國在1960年代開始援阿的觀點不同，該文通過對一手檔案史料之考察，認為1956年5月中國就已經開啟了對阿援助的步伐，中國紅十字會電匯一萬元人民幣以幫助阿富汗災民，此一事件在中國對阿援助的歷史進程中具有開創性意義。對包括周邊國家在內的亞非民族國家進行經濟援助，是新中國積極倡導並奉行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體現，反映了中國同周邊國家睦鄰友好的真誠願望。

其次，該文探討中國對阿援助問題，但並沒有就此止步，而是從對中國政府援阿的發軔、停滯不前、轉機、大規模援助的啟動等幾個階段的概括和梳理中，以點帶面地探究此一時期中阿關係發展演變的歷史特點。同時在對不同階段的分析中，作者也力圖呈現蘇阿、印阿以及美阿等錯綜複雜的多邊關係，揭示歷史事件和歷史過程中的諸多變量和影響因子。

此外，作者就中國對阿援助的歷史過程進行考察的同時，運用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方法，將援助問題放在更宏大的歷史和空間維度之中來審視。作者認為此一時期中國對阿援助政策在中阿關係史上作用重大，此後中國在較長時間內延續了該對阿政策，並維持了中阿關係較為友好的局面。

阿富汗是中國在南亞地區的重要陸地鄰國，當前中阿關

係的發展引人矚目，阿富汗問題和中阿關係的研究也因此成為學界關注的熱點和重點。該文無疑是這一學術熱點中的重磅之作，為深化中阿關係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審視視角和學術理路。

穆阿妮 北京
2024.5.4

抗戰形勢下的兩次伯力會議

學界現有關於東北抗日聯軍歷史上兩次伯力會議的研究，多以中共黨史或中國革命史作為敘事線索和研究視角，引證資料也以中方資料為主，強調中共東北黨在兩次會議中的主要領導地位，規避了共產國際和蘇聯因素，並將中、日、蘇關係以及蘇聯與東北黨的複雜互動關係進行遮蔽或模糊處理。郝江東的〈東北抗聯與兩次伯力會議再探——以蘇聯遠東戰略為中心〉（《二十一世紀》2024年4月號）則是利用中俄雙邊檔案，以蘇聯視角，將東北抗聯研究放置於更廣闊的反法西斯抗戰戰線的國際視野中進行考察，並通過梳理兩次伯力會議的緣起、進程、內容、衝突及影響，揭示蘇聯在兩次會議中的決策與主導地位，指出蘇聯的目的在於整合、掌握與利用東北抗日力量，服務於自身的遠東戰略，維護自身的國家安全和現實利益。

通觀郝江東的〈東北抗聯教導旅組建過程中的蘇聯因素〉、〈根據四份俄羅斯檔案看東北抗聯教導旅歷史〉、〈遠東戰役視角下東北抗聯教導旅初探〉等系列論文，該文可視為前史，解釋了蘇聯遠東戰略的基

本目標為甚麼由「爭取與日本維持友好關係」調整為「加強與東北抗日運動互動」，並逐步增強對東北抗聯的支援。其動因在於兩個時間節點，一是1938年6月時任蘇聯內務人民委員會駐遠東全權代表留希科夫（Genrikh Lyushkov）叛逃日本事件，導致蘇聯遠東情報和軍事系統陷入崩潰，蘇日的軍事態勢日益緊張；二是1940年9月德、意、日《三國同盟條約》簽訂，國際局勢大變，進一步加劇日軍對蘇聯國家安全的威脅。

因此，蘇聯於1938年底和1940年底分別召開兩次伯力會議，以求有效實現對東北抗日力量，尤其是對東北抗聯的控制與利用。1942年8月，在蘇軍主導下，東北抗聯教導旅在蘇聯正式組建，並編入蘇聯遠東軍序列，體現了蘇聯遠東戰略意圖。但在蘇聯與東北黨、軍交往的逐漸深入中，東北黨、軍的內部問題以及蘇聯與東北黨、軍的矛盾衝突也日益突顯。對此，以周保中為代表的東北主要領導人一再重申中共黨的獨立與自主性，強調東北抗聯首先是愛國主義者，然後才是國際主義者。然而受制於諸多因素，東北抗聯的命運與前途已然與蘇聯遠東戰略纏繞在一起。

該文通過多方資料、多重視角來全面考察蘇聯和中國東北黨、軍在伯力會議中的衝突和妥協，這些都是雙方基於自身和國際形勢下的戰略博弈和抉擇。同時，在研究方法與觀念上，郝江東將國際史、多邊檔案互證等冷戰國際史領域的概念、觀念與研究方法引入東北抗聯史研究，為東北抗聯史研究增添了新角度和新觀點。

王廣義 長春
2024.5.13